

情牵魂绕 梦里是故乡

——记我的父亲陈景山

□陈玉玲

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大陆；大陆不可见兮，只有痛哭。
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故乡；故乡不可见兮，永不能忘。
天苍苍，野茫茫。山之上，国有殇。

——于右任《望大陆》

于右任的这首《望大陆》，表达了先生渴望叶落归根，回到大陆故乡；渴望祖国统一，却又无能为力的矛盾而深厚的情怀。而这何尝不是我的父亲陈景山——一位直到离世都没能回到台湾故乡的老人心底的愿望呢？一湾浅浅的海峡，故乡在那头，父亲在这头，竟成了父亲最大的乡愁……

少小离家，怎奈未有归期

1920年7月，父亲出生在台湾台北板桥“林家花园”隔壁的一户穷苦人家，那时全家人仅靠他的父亲和叔父在“林家花园”做工生存。父亲3岁时，我的奶奶因贫病交加，离开了人世；7岁时，我的爷爷也离开了人世。父亲和姑姑被其叔父陈友良收养，可窘迫的叔父生活也难以继，于是懂事的父亲经常去码头帮工。8岁那年，他流落到日本，给人当小工。那时的父亲由于年龄太小，加上人生地不熟和语言不通，受了很多苦。所幸后来遇到了一位姓顾的旅日华侨，这位华侨收养了他。

几十年后，当父亲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，他已经记不清当年幼小的他为什么会远渡重洋去日本，但那些年对家的渴望依然深深印刻在他的记忆中。

抗日战争后期，日本为挽救在中国和其他战场的失败，在其国内大肆征兵，24岁的父亲也在其中。但是，有志气的中国人又有几个会帮助外敌攻打自己的同胞呢？1944年的秋天，他们全船的中国人民在青岛附近的海面起义，新四军新编二十师接管了他们。在安徽宿县时，父亲被编入运输连三排九班。

1946年，在一次给部队运粮的途中，他们与国民党军队遭遇，交火中父亲的左腿负了伤，部队将他安置在一个老乡家里养伤，之后部队就开拔了。伤好之后，父亲和部队失去了联系，便先后扒火车、轮船到了南京、芜湖、安庆、东流、九江、汉口等地。为了生存，他到处给有钱人家做工、扛活，过着打杂糊口的流浪生活。

1947年，父亲来到湖北蒲圻大桥的忻庆公司做小工，不久被招到桥工处开汽艇，后来连船带人调入粤汉铁路的第二钢梁队（在广东韶关）负责沿铁路修理桥梁，一直向北，来到了长沙以北的浏阳河大桥担负维修工作。虽说要根据工作需要东奔西走，但是总算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，于是他开始存钱想要回台湾老家看望亲人，可是命运一次次地和他开了玩笑，起先是几次存钱被人偷去，后来当他终于存够了钱，却因海峡两岸人为的隔离，再也回不去了……

爱与感恩，平凡之中默默奉献

1949年，长沙解放，父亲所在单位被铁道兵三支队接管，并随之南下株洲。父亲因此被转为国家正式铁路员工，开始了铺架铁路干线的工作生涯。他干过普工，铺过钢轨，架过桥梁，后又当上了内燃钳工。由于其所在单位是个施工单位，流动性相当大，从椰林飘香的南国，到绿草茵茵的北疆；从浩瀚的东海之滨，到辽阔的大西北草原，全国各地几乎都留下了这个台湾人的足迹和汗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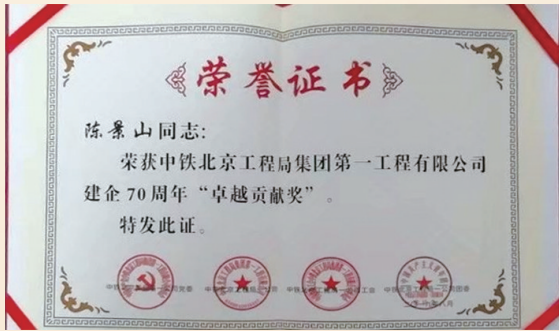
1950年支援大西北建设，父亲随所在单位来到陕西，后到甘肃、新疆架设铁路。1952年，父亲在长沙与母亲结婚，经过20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，他终于有了家。丰富的工作经历，使父亲掌握了许多技能和知识。父亲心怀感恩，再加上他工作踏实、肯钻研，解决了不少工作中遇到的难题，多次受到表彰和嘉奖。

1952年，在甘肃省武山县潘安镇的桥梁施工中，由于桥基渗水无法排除，不能继续作业，眼看就要影响工期，并威胁到桥基的稳固，父亲经过多次反复试验，土法上马，利用竹筒代替钢管，设计了20台手动抽水机，安在桥基上抽渗水，减轻了体力劳动的强度，提高了工作效率，使施工任务提前完成。为此，他受到了领导的表扬，光荣出席了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劳模大会，荣立一等功。

1975年，他们单位从东德进口的一台160K发动机需要大修，因无零件，如果单位自行修理，不仅要拆厂房，还要进口一些特殊设备，大家纷纷建议领导送到外单位修理。父亲仔细检查了这台发动机，认为不用送出去修理，也不用拆厂房和进口设备，于是在单位领导的支持下，他主动承担了任务，根据自己多年积累的修理经验，找来了上海140K发动机作参考，在工友们的帮助



1979年7月3日，父亲的事迹刊登在《陕西日报》。



2019年8月26日，父亲获得“卓越贡献奖”证书。

下，采取代替、改装、加工等办法，仅花费300元，就把需要5000余元才能修好的发动机修好了，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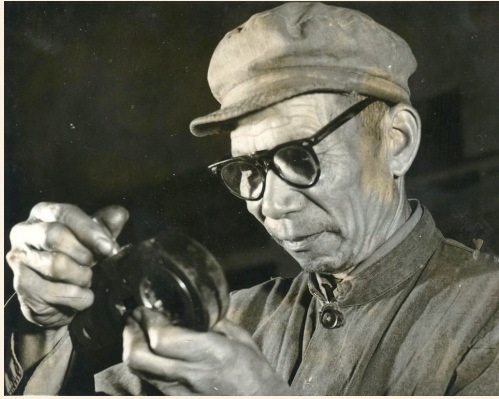
1977年，父亲和工友们成立了利用“废旧材料”班，并被任命为班长。他早上班、晚下班，脏活、累活抢在前，就连打扫卫生、提水、生炉子、擦机器等这些不起眼、没技术的工作，他也抢着干，为年轻人树立了榜样。在修旧利废的实践中，他带领大家大搞实验，利用焊补、改型、配装、喷涂等修理工艺，把收集的废料进行修复，变废为宝。

仅一年时间，他们修理了各种报废配件1500多件，价值两万多元，利用率达30%，不仅为国家节约了原材料，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修理材料来源短缺的问题，并在1979年出席了铁一局一处科技大会，事迹被《铁路建设报》刊登，《陕西日报》也进行了图文报道。

2019年8月，父亲被中铁北京局一公司评为“十大劳模”代表，颁发了“建企70周年卓越贡献奖”证书。

自小生活在台湾淡水河边的父亲，水性很好，虽然没能再回到故乡，可是几十年来他还是喜欢在工余时间去水库、江边钓鱼。正因为他经常去水边，所以他多次搭救落水群众，曾先后三次在水中救起了四人。

1969年，父亲所在单位从甘肃省兰州市搬到了汉中南洋县谢村。有一天，父亲正在汉江边钓鱼，他单位的



父亲陈景山的工作照。

一个老工人和两个青年人在江边洗澡，突然那个老工人碰上漩涡，被卷下水去，两个青年人吓得大声呼救，父亲听到后，衣服也顾不上脱，就从浮桥上跳下去，将其救上岸。

1970年，在西乡县茶镇，父亲单位的一台推土机因施工需要在汉江支流的一块沙洲上推沙，突降暴雨水位猛涨，驾驶员和推土机被困住了。父亲闻讯后立即跑去江边，发现推土机已经被水淹没，驾驶员站在推土机上，水已没过脚面，可是水深浪急，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父亲借了一只小船，冒着翻船的危险，在大家的帮助下，把驾驶员救了回来。

1977年，年近六旬的父亲在铜川耀县（现耀州区）第三次从水中救人，而且一次救起了两个人。那是7月的一个星期天，父亲来到了离家较远的桃曲坡水库钓鱼，刚走到水库西边大坝，就听到呼救的声音。他循着声音跑过去，发现落水的人在水库东边，可他在水库西边，要是沿水坝从西跑到东时间太久，救人是来不及的，只有直接游过去才能最快到达，看到他要跳入十几米深的水中过去救人，岸上围观的群众劝他：“老同志，您年纪太大了，太危险，不要下水，等水库的人来了再让他们去救吧。”

可时间不等人，父亲跳入水中游到东边，在岸上群众的协助下，将两位落水者救上了岸，给他们做人工呼吸，直到两人脱离了生命危险。两位年仅18岁的少年得救后，父亲穿上衣服悄悄回家了。被救的两位少年的家人及所在单位领导经多方打听，找到了父亲。知道父亲是台湾人，他们还特意学会鸡蛋面线煮给父亲吃。后来，父亲水库救人的事迹传开了，耀县政府也对父亲进行了嘉奖。

因为工作出色、舍己救人，自1978年起，父亲先后被推选为耀县（现耀州区）、铜川市人大代表；渭南市政协常委、人大代表，并在1983年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“台湾同胞为祖国做贡献经验交流会”，受到了邓小平、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。成绩面前，父亲并没有就此满足，而是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工作。

在担任渭南市政协常委期间，父亲虽已年届70，但他不辞辛劳，仍然与其他同志一起骑自行车下乡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，认真履行参政议政职责，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。

望断故乡，落叶未能归根

离开故乡几十年，无论走到哪里，父亲对故乡那份深深的眷恋之情始终没有改变，他始终没有忘记故乡台北板桥那距离“林家花园”不远的低矮小屋和门前那棵荔枝树……

1979年，《告台湾同胞书》发表，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，明确提出一系列发展两岸关系、促进和平统一进程的政策措施。父亲听到广播中《告台湾同胞书》“昔人有言‘每逢佳节倍思亲’。在这欢度新年的时刻，我们更加想念自己的亲骨肉——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。我们知道，你们也无限怀念祖国和大陆上的亲人。这种绵延了多少岁月的相互思念之情与日俱增……我们之间音讯不通，来往断绝，祖国不能统一，亲人无从团聚，民族、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……”时，父亲激动得热泪盈眶，他期盼着可以早日回到故乡台湾寻找亲人，早日带儿女祭拜先祖。

1987年11月，台湾开放了民众赴大陆探亲，开启了两岸的交流序幕。父亲的思乡之情更加深切，他不断委托家有亲戚从台湾来大陆探亲、旅游的朋友，或从大陆回台湾探亲的台胞帮助寻找自己的亲人，但由于父亲离开家乡时年龄太小，朋友们虽多方努力，但却一直未能帮助父亲找到家乡的亲人。

1997年3月，父亲得了一场大病，昏迷的父亲念叨的依然是台湾板桥和淡水河。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，父亲的身体渐渐康复了，但身体状况已明显不如从前硬朗，可他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与日俱增。那时，他常常在清晨拄着拐杖站在高坡上向东方眺望，望着太阳升起的那边，那里就是阿里山，就是他的故乡台湾。七十年的离别，七十年的期盼，七十年的泪水，七十年的磨难，一切都化作他对故乡深深的思念。他苍老的面颊流着泪水，多么希望那升起的太阳能给自己架起一座回家的彩桥，使他跨越那高山大海，回到日思夜想的家乡……

1999年7月，带着对故乡深深的眷恋之情，父亲离开了人世。那段日子，父亲似乎预感到此生无法回到家乡台湾，孱弱的他在昏迷中要吃芭乐，会一段一段地讲闽南话……清醒时，他会跟我说，家乡的甘蔗最甜、淡水河的鱼虾最鲜；他还跟我说，有机会去台湾，一定要带上一把他的骨灰撒在家乡的土地上，以告慰天堂的爷爷奶奶。父亲去了，然而他祈盼回到故乡、叶落归根的夙愿却始终未了……

父亲和《自然辩证法通讯》

□郭涛

父亲的办公桌上，永远有《红旗》杂志、《人民日报》和《自然辩证法通讯》。父亲很看重《自然辩证法通讯》，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因为那时我还不到14岁。若干年以后，想起父亲生前说过的一些话，联系起来思索，才恍然大悟。父亲出生于1935年，1960年7月从陕西师范大学首届中文系毕业，先从教，后从政。

计划生育是人称“天下第一难”的工作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和父亲一同在杨峪河公社共事的老苟叔，曾经说我父亲对计划生育工作比较消极，一次，县委牛副书记和杨峪河区委领导到杨峪河公社检查计划生育工作，指责公社计划生育工作落后，我父亲和牛副书记顶牛，据理力争，替农民说话，像吵架一样，公社干部吓得都推着自行车去下乡了，那次父亲和上级顶牛给苟叔印象深刻。

杨峪河中学屈校长说，我父亲在突发脑溢血前夜，约他到公社谈天，交代他照管上中学的我和我弟，屈叔以为我父亲因工作马上调离，才这样说，结果没料到是父亲的生前遗言。

一次，我坐父亲自行车后座，在杨峪河路上走着。父亲遇到一个人，停下车，两人谰闲传。父亲瞅着沿路的农民房子感慨说，农民修新房是好事，居住条件改善了，就是生活进步的标志。社会发展，就是要农民住好吃好。当时父亲身为公社党委书记，我家居住的三间土屋低矮，下雨就漏，屋里到处是盆盆罐罐，接屋瓦漏水。一家六口，挤在一个大土炕上。每到春天，也遭饥荒，买根借粮渡春荒，我穿旧的衣服退下弟弟穿。1975年夏天父亲去武汉长江大桥参观留影，穿的黄胶鞋，非常简朴。

父亲对我伯父说：“让我六娃哥在部队好好干，吃了苦是好事，不是坏事，不要怕吃苦。”

父亲对亲戚说：“社会是真的，人是假的。”他如果不是有顶“公社书记”官帽，杨峪河公社任何一个农民，能认得他是谁。

父亲离开我41年了，我经常思念父亲，想起父亲说过的话，父亲的朋友同事谈起父亲，对父亲是敬重和赞誉的。我第一个工作单位是商县县委办公室，副主任李叔说：“小郭，你太骄傲自大，你父亲是老牌大学生，我们去杨峪河公社下赵源蹲点，你父亲学问好，非常客气谦虚，对人非常尊重。”

曾经在县委宣传部工作，任过商县县委党校的全校长说，他们去杨峪河公社下赵源驻村，晚上搞计划生育突击活动，我父亲说县上的同志晚上就不用参加，公社和大队干部熟悉情况，他带他们去搞计划生育突击活动，全校长说我父亲工作很有一套，照顾县上干部，避免和群众发生直接冲突。

《自然辩证法通讯》杂志，我当年看过，里面文章当然无法看懂，但是少年的记忆里至今忘不了。因为，那个杂志和父亲有关，一个公社书记，始终爱读《自然辩证法通讯》，一定有他的原因。

我工作后，读过一些恩格斯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著，才忽然想到父亲为啥爱看《自然辩证法通讯》杂志了。

父亲办公桌上的《自然辩证法通讯》杂志，至今还有几本，我一直珍藏着，它是父亲的宝贝。



1985年，父亲（左一）与一起参加公祭黄帝陵典礼的陕西台胞合影。